

汉川善书与汉川节令和民俗的联系及其意义 的论文

文化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汉川善书是盛行于湖北省汉川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地方性曲艺品种。因其主流思想健康积极、故事性强、情节生动、讲唱并美而在当地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与黄陂花鼓、阳逻高跷一起被人们誉为“湖北三盛”。其艺术特点和风格可以概括为十个字：正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2006年，汉川善书以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丰富的人文内涵、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汉川善书的自身特质使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艺艺术存在的同时，也与汉川当地的传统节令和风俗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由此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介绍汉川善书的历史渊源以及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有着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并试图揭示这些联系所产生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川善书 故事文本 表演形式 岁时节日 地方民俗

俗

目 录

前

言 1

1 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 2

1.1 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 2

1.1.1 题材类型 2

1.1.2

.....
..... 10

3 汉川善书结合当地节令和民俗的积极现实意义 12

3.1 二者结合以后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社会效果 12

3.2 节令民俗得以保存其鲜活生动的珍贵生命活体 13

3.3 汉川善书借之获得了极为广阔的传承发展空间 14

结
语
..... 15

注
释
..... 16

参考文
献
..... 16

前 言

善书是劝人们为善去不善之书，最初是宗教徒通过讲述与佛教、道教有关的故事而宣传其教义，对世人进行劝化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宗教性。www. . CoM 善书何时脱离宗教自成一体，得以正名，目前有证可考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钦颁善书”《为善阴鹭二卷》，其“前有大字御制序……因采辑传记，得百六十五人，特命梓传天下云云。每人中以四字标题，如上卷之起蒋王灵应，止于仲淹经济，下卷起张泳惠民，止周妇感悟之类是也，字版皆大，所引皆系正史，句皆有圈，最便阅览”。这便是初期供人阅读的案头善书。此后善书向着世俗化、文学化方向演进，逐步成为以生动活泼的说说唱唱的方式来演出，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其突出特点是演说的故事以善恶报应不爽为主题，劝人积极行善，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意义，因而到了清代受到皇家重视。如康熙皇帝曾亲颁“圣谕广训”，清廷将这些“圣谕”辅之以善书这种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宣讲，成为清朝构建满汉和谐，巩固清室统治，实现太平盛世的重要“德治”

工具。人民群众对这样的善书不满，进行抵制，但是对于这一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说唱形式则是欢迎的。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日趋腐败衰颓，善书的编、讲逐渐由官办走向民办，各地书局、作坊也相继编印了大批善书的单行本和合订本。至清代末叶，善书由朝廷进行民众教育的工具变成了表现人民善良愿望、宣扬社会美德的群众文化活动。善书民间艺人从官家手中接过这一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后，用大量民间传说、神话传奇、生活故事等对原善书的故事类型和内容进行了改造和丰富，从而使善书成为广大民众进行娱乐和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使善书汇流于民间文学的长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华教授在对汉川善书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后指出——“善书这种说唱艺术本来流行全国，更是遍及湖北江汉平原的各个角落。辛亥革命以后，北方的善书逐渐消逝，而在南方地区流行的善书，也由于因循守旧，承袭了呆板的演出形式，加上不注重发展壮大艺人队伍，所以，至解放后相继被本地形成的早于善书的其它曲种，如鼓书、评书、小曲等所淘汰，渐趋衰亡。唯有汉川的艺人坚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并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打造了汉川地方文化品牌名片‘汉川善书’，使之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拥有一大批艺人和广大听众。加上当地文化部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抓住它不放，作为地方特色曲艺品种不断推陈出新，使它在当今城乡文化娱乐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至今积累到三四百个新旧书目；由于汉川善书同当地城镇茶馆说书休闲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相融合，而又能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它的内容，改进它的表演形式，因而使汉川善书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姿态，可谓是源远流长。南方流行的‘善书’和北方流行的‘宝卷’属同一类型，它们都由唐代僧人在寺庙的俗讲演变而来，本来是含有浓重宗教色彩，形势较为单调的。但在湖北汉川一带流行至今的‘说善书’，保持了它贴近民间生活，富于道德教化的可贵特色，而且由男女艺人上场交叉演唱宣讲，形式灵活，既简便又生动活泼。这样，它就在当地的民间文化生态中显得生机旺盛了。于是使得‘汉川善书’闻名于世了。”

1 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

1.1 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

1.1.1 题材类型

“汉川善书”是一种地方民间曲艺说唱艺术，其题材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艺人们的术语称之为“案传”。所谓“案传”，就是凡根据经官府判定了的案情，编成故事用来宣讲的，谓之“案”，如《一口血》、《四下河南》等；凡根据生活故事等编写用来宣讲的，谓之“传”（也叫“书”），如《萝卜顶》、《吉祥花》等。艺人们往往把二者结合起来统称“案传”，实则代表了汉川善书的两大类题材——公案故事和生活故事；后者细分的话还可

分为传统民间故事、现代社会生活故事、神话传奇故事等小类。

1.1.2 思想内容

早期汉川善书思想内容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一个个充满因果报应的故事来表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善思想；结局总以“好人有好报，恶人遭惩罚”的“大团圆”方式收场。过度的理想主义取向和公式化倾向比较严重。众多书目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迷信色彩等封建糟粕。

汉川善书能不能创演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案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与时俱进的服务呢？事实已作出了答复：能！并且服务得很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汉川善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适应时代潮流的要求，与新一代观众文化层次的提高、知识结构的改变、人生价值的取向、审美情趣的角度相时而动的发展变化态势。所宣讲的案传内容已不再囿于仅仅宣扬因果报应这一范畴，民间善书艺人除了对传统书目中的消极因素进行剔除，对故事内容进行重组外，又改编创作了许多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社会故事、道德故事、传奇故事、侦破故事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编故事，并把它们搬上善书讲台。在秉承“讽恶扬善，劝世化人”的善书本源精神不动摇的前提下，多角度地反映现实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如反映婚姻自主的《何月英的故事》、反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劳动的《李二姣割谷》、反映纯真爱情的《茶碗记》、反映改邪归正的《赌回头》以及《飞鸽案件》、《双团圆》等，歌颂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鞭挞现实生活中的坏人歹徒不良现象，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创作能力较强，对时代气息具有敏锐感触力的新一代青年善书艺人创作了一批以当代社会生活重大现实问题为题材的善书新剧本。如著名青年善书艺人熊乃国于二零零一年根据法轮功受害者真实而惨痛的经历创作了揭批法轮功邪教本质的善书案传《迷途惊梦》，于当年春节期间在各地巡回宣讲，以有别于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本地独特民间曲艺表现形式，通过善书先生们声泪俱下的全情投入与精彩演绎，生动、深刻地使观众进一步看清了法轮功害国害民的邪教本质，有力地配合了当地政府正在深入开展的“揭邪教，明真相”的群众工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各界群众的广泛赞誉，表现了当代汉川善书与时俱进的一面。此外，如善书老艺人徐忠德为配合计划生育在当地农村顺利实施而新创的宣传这一基本国策的《三子不认娘》、《女儿养老》等新编善书也以其曲折感人又不失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和对农村仍然存在的重男轻女的思想 and 行为的现实针砭意义而广受群众欢迎。

新时期汉川善书中出现的各类新题材及其表现出的积极的思想内容为汉川善书的艺术机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1.1.3 结构框架

汉川善书结构框架的特点明显受到宋元时民间“说话”

艺术和我国古代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体制的影响。如有“入话（头回）”。入话是话本小说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此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或对比关系。显然，入话（头回）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汉川善书也是这样，主讲先生在开篇前往往会念一首定场诗（入话），有时还会在念诗后说一段与正书故事思想意义相关类比或相反对比的小故事（头回），然后再开始正式讲书。如善书艺人徐忠德在其代表作——讲述邻里之间遇事各让一步共同得福的《白公鸡》前，会念一首诗：“心宽天地宽，小事莫结冤；试看宽怀君，相善走鸿运。”点名题旨，再讲一个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后成就大业的小故事类比《白公鸡》的故事内容之后，才会进入“正话”部分，开始讲书，其间根据故事情节穿插宣词先生的演唱。结束后，徐忠德还会用一首诗或自己对本部书的议论作为“篇尾”。

1.2 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

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是“韵散相间，讲唱结合。”

“讲”即叙述，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散文部分，又称为“梗子”。“讲”由主讲先生担纲，就是主讲先生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观众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事件与情节的进度和变化，书中人物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进行典型环境的设置等等。由于主讲先生在叙事时不作为人物角色进入故事情节，而相当于一个对故事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等了然于胸的“旁观者”，故有许多灵活性可图。整部书主线的贯穿，副线的交叉，层次的安排，矛盾的编织，悬念的设置等等，实际上只有依仗“讲”来完成。此外，主讲先生往往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在书中紧张、热闹处，充分运用自己的虚构才能和想象力，添枝加叶，把这些精彩的部分尽量盘旋，以达到精细刻画人物，渲染情境氛围，突出故事重点的目的。并往往通过巧妙的故事收尾时的匠心演绎，使整部书浑然一体，令观众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或振奋，或感叹，余味无穷。

“唱”即宣词，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韵文部分。“唱”由宣词先生担纲，就是宣词先生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直接扮演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一般宣词先生有两到三人。宣词先生宣词时，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情绪，选择特定的善书曲牌唱腔，通常以“三三四”的句式来演唱书中人物的语言，即每一句唱词都由两个三字音尺和一个四字音尺组成，唱词上下两句为一行，唱腔反复，一韵到底。如：

“痛伤情不由我珠泪落下，止不住伤心泪湿透衣裳。”

尊夫君你听妻细把话讲，肺腑言务必要谨记莫忘。”

.....

通篇押“ang”韵。

宣词先生从“我”的角度，以富有表现力的唱腔塑造书中人物形象，展示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直接表现人物之间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层层发展。艺术功力深厚的宣词先生往往采用“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艺术思维方式对书中人物的心理、表情、动作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把握，以情带声而声情并茂，以声结情而情声俱盛。能将书中人物塑造得须眉宛然、鳞爪毕现，从而生动传神地抒发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观众感到亲切、真实、自然，对书中人物的遭际、命运感同身受，唱者与听者皆入书中。宣词是善书表演中最出彩的部分，一部书中最感人的情节和矛盾冲突的高潮部分通常由大段的宣词来完成。

宣词分为独宣、对宣、答宣三种形式，三种形式中答宣这种形式用得最多。所谓“答”就是在宣词的过程中扶案先生针对宣词内容的插白。扶案先生一般一到两人，既无讲的任务也无唱的任务，纯以生动的方言口语来与宣词先生的唱词一唱一答。这看似比主讲、宣词要简单得多，实则不然。善书艺人们有个说法曰：“内行听说词，外行听宣词，同行听答词”。可见讲难于宣，答词则更难，最考先生的艺术功力。善书演出中，宣词先生的大段悲腔往往使观众的精神负担沉重，而扶案先生的答词却可以用“包袱”来调节现场的气氛和观众的情绪。答词一般不写在案传中，全靠扶案先生平时的生活和艺术积累与临场发挥。好的答词能令书中的善者愈善而令人敬；恶者愈恶而令人恨。甚至还能左右宣词先生的情感张力。同一个宣词先生和不同的扶案先生配合演出其艺术表现力和效果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有天壤之别，出色的扶案先生就像一个优秀的指挥家一样，根据书中情境和人物心理，起伏有致地调动宣词先生的声与情；张弛有度地调节观众的情绪和现场的气氛。扶案先生的答词既是“包袱”的制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他一会儿让人心酸流泪，一会儿又令人捧腹大笑，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急缓相间、有起有落。扶案与宣词答对自然，生活气息极浓。例如宣词先生哭了一大场，哭得人鼻酸心软，这时扶案先生丢个“包袱”：“唉，再莫哭了，引你睡吧。”突然煞有其事地说：“哟，只顾哭，你还有屙尿，赶快抱起来屙泡尿，莫屙到床上去了，天涩洗了不得干就戳了肥拐了……”马上引起了观众的笑声，这样有张有弛，有起有伏，气氛活跃，答得自然合理，艺人上下场也不僵了。

一部书通常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场”这一组织单元。每部书的故事都由若干场组成，场与场的变换由上、下场时先生之间的对白衔接。每一场都是由主讲先生讲一段，宣词、扶案先生唱、答一段加上换场时角色间的对白完成。由此开启推动故事的起因、发展、高潮、结果，前后照应，首尾圆楔。

汉川善书的这种以第三人称的“讲”和第一人称的“宣”、“答”、“对”相结合的互补结构与评书等以单人表演的曲艺形式相比较，进一步扩大了案传故事的时空领域，增强了表现情节时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汉川善书采取这样的人称交叉叙述的叙事方法，使被叙述的情节和人物得到全方位、立体化的表现。

“讲”、“宣”、“答”、“对”四项都要求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脸生色”、“目生光”，以表喜怒哀乐之感，调动观众内心之情。

综上所述，汉川善书以其历史渊源、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汉川当地及其周边地区可谓是土厚枝繁，根深叶茂。有着广阔的演出市场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主要表现为汉川善书与当地的岁时节日和乡风民俗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的联系及其表现

在汉川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是农村，在民众心目中，认为无论请善书或是听善书都是一种现实的善行，是非常吉利的事情。期望“善有善报”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积淀和生活理想在汉川民间请、听善书过程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达。与汉川岁时节日和民俗等联系起来的善书有别于在书馆中讲书。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体出钱请善书艺人到村、组讲书的，这叫做公书；也有少数富裕农户自己出钱请善书艺人到家讲书的，这叫私书。请公书的目的一般为祈求本村、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平安；私书则多为表达家庭、个人的酬神谢仙、敬祖收宗、驱鬼送雉、祈福消灾、求子延寿、旺财去病等愿望。尤其私书发展到现在，好多农村家庭在老人祝寿、小孩满月、乔迁新居、红白喜事甚至家中有学生考上大学时都请先生讲善书，图个吉祥喜庆红火热闹。汉川的许多节令和民俗讲究都会通过善书表现出来。

2.1 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的联系及其表现

汉川请善书的岁时节令最重要的有三个：春节、清明节、中元节。

2.1.1 春节善书

春节时请的善书往往是公书。春节讲公书常常是几个相邻的村庄事先约好固定请一个善书班子，这样时间上便于安排。各村依照下帖请书时间的先后，依次开台讲书。通常一个村一台书，一个春节讲三天，连续在每年相同的时间连讲三个春节；也有经济条件好的村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请善书先生在本村各组轮流讲书。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大节，在诸节日中地位最为重要。春节乃新岁之首，万物发生、万象更新。人们对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年寄寓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春节时的公书除了娱人之外另一重要目的是娱神，即迎接、祭祀喜神与社神。“喜神”也叫吉祥神，是古人为了趋吉避凶、追求吉庆而创设的神。开始其形象比较抽象，后来结合民间流行的“福神”

形象加工而成喜神的模样。汉川民间把“和合二仙”敬奉为喜神，认为每逢新春时天上必降喜神，迎至可保阖村全年万事如意。“社神”是地方社会集体的主神，汉川民间认为社神具有主司农事、保护村社成员的职能。因此，春节的公书，村社成员对社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诚敬及公共的愿望。请社神的主要目的是为村社祈福，不像私书那样各怀私愿。春节公书的公共性原则是汉川民间村社共同体风习的现实反映，而社神是公共意识的投射，是村社的精神中心。同时，社神祭祀的公共性活动，又为村社成员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维系力量。

“喜神”与“社神”的画像在春节讲善书时被共同供奉于书台之上。除开台讲书前，善书主讲先生及村社重要人物要焚香表、鸣鞭炮恭迎，供三牲福礼祭祀外，讲书时，观看善书的绝大部分村民都或在台下或烧香祷告，或上台向“善惠”箱中投钱施“善惠”（关于善惠的讲究下文有详解）。以自己现实的善举向所供诸神为自己的村社祈福。“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村民对春节公书的热情和投入，体现了村社成员的公共意识与集体精神。

在汉川民间，乡村春节的公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娱人兼娱神的文化活动，同时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说，也是乡里市井社会关系的一种缔结与再造。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理民事纠纷的功用。村社成员在统一地域环境下朝夕相处，有着大致相近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在较早的时期应该还有部分村社公产，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上彼此亦有着较多的互助需要。但也难免会为一些诸如田地边界、宅基地、引水灌田等事发生一些摩擦和龃龉。春节是人们一年中难得的闲暇时光。春节的村族公书更为日常忙于生计的人们提供了集体交往的时间与空间。人们在聚集观看善书时，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共祝新生。村社成员之间的人情、乡情在为公书出钱出力，共同为本村祝福，观看善书时相互交流自己对情节、人物的看法和见解中得到了强化与更新。平日有矛盾的村民，在为春节公书搭建讲台时遇到了，往往会在为共同目的劳动合作的过程中，相视一笑，握手言和。又如两个家庭间为些小事关系紧张，在观看春节公书时碰到一起了，这时也往往会有村中有威望的长辈拿来两柱香，交给双方的户主，点燃后共同上讲书台向喜神与社神敬香。两家一般都会在敬香后的互道“新年好”、“新春愉快”的祝福声中消除隔阂，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构成真诚相处的和谐气氛。从春节公书的故事中受到教益化解矛盾的事例很多。著名善书艺人徐忠德有一个通过春节善书化解两家矛盾的生动事例：徐忠德 2000 年春节在汉川汪家河村讲善书。村中有两家打架扯皮。村支书问徐忠德有没有劝人不扯皮的善书。徐忠德说有，晚上讲了《白公鸡》一书。两家被善书中与人为善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和解了。徐忠德说：“不行孝的，听了书以后变为行孝了；不讲理的，听了书以后变得讲理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35320022011011320>